

# 调查研究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 ——以孙冶方学术探索为中心的考察

李 卫

**摘要:**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经济学工作者的时代任务,需要科学的方法论支撑。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探索者,孙冶方将调查研究视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功,以唯物辩证法为其方法论基础,使调查研究超越了单一技术性方法,成为具有广义内涵的研究路径。通过调查研究,孙冶方在本土知识的检验、基于本土实践的理论创新以及本土学术规范等方面作出了重要探索,触及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知识”“自主”“体系”三个核心维度。孙冶方的学术探索为当代学者通过调查研究探索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孙冶方; 调查研究;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自主知识体系; “两个结合”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5.06.003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sup>①</sup>。这一重要论断为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各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尽管中国经济实践已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解释框架,但自主理论体系构建仍显滞后<sup>②</sup>,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学界亟须回应的核心议题。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蕴含“自主”“知识”“体系”三重维度<sup>③</sup>,其构建关键在于以中国问题为逻辑起点,以中国素材为内容支撑<sup>④</sup>,将中国经验升华为兼具解释力和指导力的理论体系<sup>⑤</sup>。这一过程需以科学的方法论为基础<sup>⑥</sup>,“两个结合”所蕴含的系统性方法论为此提供了重要指引<sup>⑦</sup>;而调查研究作为践行“两个结合”的重要路径<sup>⑧</sup>,则为体系构建提供了坚实支撑。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学家们在探索中丰富了中国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内涵<sup>⑨</sup>。尽管彼时尚无“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但他们的学术探索已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自主”“知识”与“体系”三重核心维度,孙冶方是代表性学者之一。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体系的积极探索者<sup>⑩</sup>,孙冶方始终重视调查研究,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开展调查,从中提出理论课题<sup>⑪</sup>。新中国成立初期,正是在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系研究”(22CJL002)。

**作者简介:**李卫,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020; liwei2020@sass.org.cn)。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99页。

② 周文、何雨晴:《西方经济学话语特征与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③ 张乾、刘同舫:《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之“知识”的哲学阐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④ 张东刚:《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若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

⑤ 任保平、郭晗:《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5年第1期。

⑥ 逢锦聚:《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和方法》,《经济研究》2023年第8期。

⑦ 贾英健、郭可珂:《“两个结合”对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原理性贡献》,《山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

⑧ 于安龙:《“两个结合”: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求实》2024年第1期。

⑨ 白永秀、闫雪培:《中国经济学的早期探索、演进历程与发展趋势》,《经济学动态》2024年第5期。

⑩ 冒天启:《重新解读孙冶方经济学思想——纪念孙冶方诞辰100周年》,《经济研究》2008年第10期。

⑪ 冒天启:《价值规律内因论与商品生产外因论——〈孙冶方文集〉序》,《经济研究》2017年第9期。

对统计工作的调研中,孙治方揭示出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价值规律的认识局限,进而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sup>①</sup>。他曾多次强调“要提高经济学水平,推动经济科学向前发展,还应当提倡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做调查研究……是万古长青、永远新鲜的话题”<sup>②</sup>。然而,前人研究多聚焦其理论体系<sup>③</sup>与理论贡献<sup>④</sup>,对孙治方如何通过调查研究推动本土经济学发展尚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

基于此,本文立足当代学术语境,重新审视孙治方调查研究实践的广义内涵与方法论基础,梳理其在知识检验、理论创新与学术规范探索中的相关实践,以期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启示与借鉴。

## 一、孙治方调查研究的广义内涵与方法论基础

孙治方长期倡导并践行调查研究。在他的学术实践中,调查研究不仅是获取一手资料的方法,更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上的系统性研究路径,具有广义的学术内涵。

### (一)孙治方调查研究的广义内涵

从孙治方的论述与研究实践看,他所指的“调查研究”并非狭义的田野调查、统计抽样等具体方法,而更多是包含了实地调查、资料整理与理论分析等相互衔接的研究环节,构成一种从实践出发的广义经济学研究路径。他曾言:“经济研究的基本功应包括读书和调查研究两个方面……调查研究不仅要注意典型调查,而且要注意综合性资料的搜集。”<sup>⑤</sup>在当时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制定的培养标准中,对助理研究员的要求也包括“能独立搜索资料,进行调查,分析问题和提出研究成果”<sup>⑥</sup>。他曾多次将“调查和研究”并列提出<sup>⑦</sup>,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多调查,多研究”<sup>⑧</sup>,并指出研究过程包括“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sup>⑨</sup>。这表明,孙治方的“调查研究”往往不是特指调查这一获取资料的环节,而是调查与资料分析、理论研究紧密结合的一套完整研究路径。

在具体调查实践中,孙治方也未局限于某一特定方法,而是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运用。例如,在湖北、湖南、广东等地,他以“访问”一词指代调查,具体形式为访谈、座谈会与下基层实地走访<sup>⑩</sup>;对农户收支问题使用了“调查”一词,详细说明了农家收支调查的目的、任务、范围,并对典型调查与抽样调查进行了详细分析<sup>⑪</sup>;在南京、无锡、扬州、镇江、苏州等地,他则使用了“视察”一词,涉及调查中的访谈、实地走访,以及对调查方法中具体问题的讨论<sup>⑫</sup>;前往苏联等国调查时则使用了“考察”“访问”等词,

<sup>①</sup> 李卫:《从经济统计到价值规律理论创新——孙治方经济思想再认识(1954—1964)》,《上海经济研究》2025年第7期。

<sup>②</sup> 《孙治方全集》第3卷,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382—383、384页。

<sup>③</sup> 刘国光、张卓元、冒天启:《孙治方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83年第8期;何建章:《评孙治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模式》,《经济研究》1983年第11期;张卓元:《加强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研究——孙治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开幕词》,《财贸经济》1985年第1期。

<sup>④</sup> 孔繁坚:《孙治方三十年代在农村经济理论上的贡献》,《经济研究》1985年第2期;刘国光:《彻底破除自然经济论影响 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模式》,《经济研究》1985年第8期;王立胜、李连波:《孙治方的学术遗产及其时代价值——纪念孙治方诞辰110周年》,《经济学家》2018年第10期。

<sup>⑤</sup> 《孙治方文集》第5卷,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第177页。

<sup>⑥</sup> 《孙治方文集》第5卷,第198页。

<sup>⑦</sup> 《孙治方文集》第4卷,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第283页。

<sup>⑧</sup> 《孙治方文集》第5卷,第115页。

<sup>⑨</sup> 《孙治方文集》第5卷,第43页。

<sup>⑩</sup> 《孙治方文集》第4卷,第42—49页。

<sup>⑪</sup> 《孙治方文集》第4卷,第124—140页。

<sup>⑫</sup> 《孙治方文集》第4卷,第158、160—163、165—166、170页。

主要形式为谈话或集体谈话<sup>①</sup>。这些多样化的调查形式显示出,孙治方所指的“调查”在很大程度上泛指面向实践的一手资料收集过程。在此基础上,还要对调查获取的资料进行理论分析和规律提炼,他强调“不仅是收集整理资料,而且要研究理论”<sup>②</sup>,“要从马列主义观点提高到理论高度来分析资料,找出规律,得出结论”<sup>③</sup>。可见,其“调查研究”是一个由深入实际到理论反思的连续过程,前后环节紧密衔接,构成一条完整的经济学研究路径。

## (二)孙治方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作为研究路径,调查研究的科学性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上,而孙治方的调查研究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与发展性视野、理论与实践结合原则以及矛盾分析法的运用。

其一,贯彻唯物辩证法的整体性与发展性视野。他坚持对经济运行过程的系统调查,强调“典型调查和抽样调查各有不同的任务和用途”<sup>④</sup>,坚持实地调查与数据分析并重,确保资料的全面可靠。他从不孤立看待现象,而是将微观问题置于宏观经济体系中加以考察<sup>⑤</sup>:例如他以微观企业管理困境为切入点,对计划与统计制度进行反思;又如他到苏联等国调研,以便比较和识别特殊经验与普遍规律。发展性视野体现为对问题的持续追踪与方法、范围的动态调整:例如农家收支调查从土改时期聚焦个体农户,到集体化后转向农户与合作社关系<sup>⑥</sup>;对固定资产折旧问题的调研跨越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覆盖多行业、多地区。

其二,坚持唯物辩证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孙治方始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调查,体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同时,他坚持以调查检验与发展理论,坚持从客观经济过程出发提出改革意见<sup>⑦</sup>,其理论创新正是源于长期深入的调查与思考<sup>⑧</sup>。他认为,不仅“研究工作需要依据实际材料和实际工作的经验总结”<sup>⑨</sup>,凡有分析有见解的调查报告、有事实根据和理论论证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也应被视为科研成果<sup>⑩</sup>。他强调读书和调查研究是研究的基本功,二者紧密结合,理论才有持久生命力<sup>⑪</sup>,特别强调理论研究要联系实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sup>⑫</sup>,直到晚年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个意思是说还要学习理论,另一个意思是说要搞点调查研究”<sup>⑬</sup>。

其三,运用矛盾分析法贯穿调研全过程。孙治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的许多具体关系和矛盾的研究,正是我们的任务”<sup>⑭</sup>。他尤为重视在调查中分析矛盾,“从具体事实出发,揭示问题的本质”<sup>⑮</sup>: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他揭示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与半殖民地国家贫困化的矛盾;新中国成立后,他指出经济体制的主要矛盾集中于总产值指标管理,表现为统计指标与企业管理脱节,源于对价值规律的认识分歧。在孙治方对价格、固定资产折旧等问题的调研中,他通过矛盾分析厘清表象与根源,既提出具体改进方案,又确立核心研究任务,充分彰显了矛盾分析法的实践价值。

---

① 《孙治方文集》第4卷,第69、71、72—74、199—200页。

② 《孙治方文集》第4卷,第241页。

③ 《孙治方文集》第4卷,第237页。

④ 《孙治方全集》第2卷,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68页。

⑤ 董辅礽:《孙治方同志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点滴》,《经济研究》1983年第2期。

⑥ 《孙治方全集》第2卷,第58—59页。

⑦ 何建章、冒天启:《孙治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体系研究》,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7年,第105页。

⑧ 张卓元:《孙治方文集·序》,《孙治方文集》第1卷,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序言第8页。

⑨ 孙治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29页。

⑩ 孙尚清、张卓元、冒天启:《孙治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第6页。

⑪ 冒天启:《在治方身边重读〈资本论〉》,金明善主编:《经济学家茶座》第22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

⑫ 张卓元:《孙治方文集·序》,《孙治方文集》第1卷,序言第6页。

⑬ 《孙治方文集》第8卷,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第145页。

⑭ 孙治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94页。

⑮ 张卓元、冒天启、旷建伟编:《孙治方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02页。

## 二、基于调查研究的本土知识检验

要理解调查研究如何发挥知识检验功能,首先需厘清“知识”的基本含义与科学性标准。当代学者多将知识界定为“有可靠根据并引向真实存在(所知)的判断”<sup>①</sup>,强调“求真”是知识的核心属性;至于科学性标准则在于其是否可证伪、可检验<sup>②</sup>。这些基本立场,不仅奠定了现代科学的理论基础,也深刻影响着各学科知识体系的形成逻辑。

对中国经济学而言,若要实现科学的知识生产,新知识不仅需要理论逻辑的自治性,还要接受中国社会经验和具体国情的检验。而孙治方以调查研究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命题的检验,便触及了“求真”原则的本土化实践,体现了调查研究在知识建构中的检验功能。

### (一)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实证困境

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准备<sup>③</sup>,而早期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在“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关涉革命方向的核心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sup>④</sup>。

“大革命”失败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在共产国际内部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托洛茨基一派认为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斯大林等则主张中国仍是受国际帝国主义牵制的半殖民地,且有半封建制度残留。这一争论直接影响到国内思想界<sup>⑤</sup>。彼时,不少苏联经济学家也主张中国已步入资本主义,陈翰笙在苏联时曾与这些学者展开争论,但苦于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拿不出更充分的实例进行反驳<sup>⑥</sup>,故回国后即着手组织团队,开展农村经济调查。1931年,孙治方在陈翰笙安排下加入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工作。

在国内,早在1922年,蔡和森便已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来分析中国社会;1928年中共六大《政治议决案》指出,中国存在半封建土地制度,且属于半殖民地国家;1929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央通告第28号》首次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一个完整表述。其后“新思潮派”和“动力派”的论战及关于社会史的争论中,马克思主义者从理论上初步论证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然而在这一阶段,论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还缺乏具体的调查研究资料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因而,论证中国社会性质仍留下许多空白和不足”<sup>⑦</sup>。“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判断尚属于待检验的知识范畴。随着论战延伸至中国农村经济领域,孙治方作为“中国农村派”一员参与其中,依托此前积累的调查资料,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命题展开系统的学理论证和经验检验。

### (二)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的实践与方法

参与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的经历,对孙治方的调查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调查内容与范围的确定是首要前提。该调查主要借鉴列宁的农户阶级划分标准,依据收租、雇工、高利贷等剥削程度,将农民划分为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sup>⑧</sup>。孙治方认为,几者间存在“质的差异”是客观事实,虽可用“量的差异”作为“质的尺度”,但中国农村经济复杂,“应该根据各地的不同的土地生产力,规定各种不同

<sup>①</sup> 杨国荣:《所知与能知:人类知识的多重向度》,《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sup>②</sup> 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52页。

<sup>③</sup> 李红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溯源:重思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6期。

<sup>④</sup> 吴敏超:《“中国经济派”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sup>⑤</sup> 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前言第2页。

<sup>⑥</sup> 因为对以农业为主体的中国而言,判断社会阶段的核心依据在于农村性质。参见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40页。

<sup>⑦</sup> 周子东、杨雪芳、季甄馥等编著:《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sup>⑧</sup>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1页。

的标准。甚至对于同一地方的生产力不同的土地……亦应该根据实际情形而折合为同一单位去计算”。同时,农户分类必须参考社会生产关系,“最适当的生产关系便是雇佣关系”。他将这种注重物质因素、又兼顾社会因素的分类法,视为研究复杂中国农村经济的最好办法<sup>①</sup>。

其次是调查对象的选择。调查旨在全面掌握中国农业生产关系,但调研团队人力有限,而中国地域广阔、情况复杂,故团队先利用既有资料,按经济发展程度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区域,再依次选取代表性样本。先以华东的无锡、华北的保定、华南的番禺等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方作试点,后扩展至江苏、广东其他地区以及河南、陕西、浙江、广西等地。既有一般性概况调查,也有重点地区的全面调查,通过对比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以及1928年与1933年两组数据来推测农村经济发展趋势<sup>②</sup>,实现对中国农村经济关系的全面估计。

在具体调查方法上,团队主要采用抽样调查与典型调查相结合。对每个调查省份,先开展概况调查,依据经济发展程度划分区域,再选取代表性县;县域调查同样先划分类型区,进而挑选代表性村庄进行全面调查,以代表性数据推算全县、全省的大致情况。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团队获得大量一手数据和实例,足以澄清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sup>③</sup>。1957年,孙冶方也明确肯定调查中国经济采用这种“划分类型区以后再按比例抽样的办法比较好”,优势在于“第一,根据统计学的原理,它可以使类型组的性质更一致,因而能够保证以较少的样本取得较高的代表性;第二,按比例抽样不仅可以避免事后加权计算的麻烦;而且误差较小”<sup>④</sup>。

### (三)基于调查研究论证中国社会性质

论战中,孙冶方首先依托调查资料厘清了一些中国农村经济的独特现象。例如对于典当的土地权属不清的现象,孙冶方指出小地主和农民常由于氏族的传统观念,不愿出卖祖田而选择典当,但事实上,回赎很少能实现,所以典出田地的人在名义上虽保留着田主的法律地位,但在统计时应该算作典入者的产业<sup>⑤</sup>。这为他把握现实复杂性、判断中国社会性质提供了坚实基础。

在此基础上,孙冶方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对“中国因列强资本输出而进入资本主义”的论断展开批驳。他指出,帝国主义向中国等半殖民地国家输出资本是为追求超额利润,而非帮助后者发展。“经济落后国度的廉价劳力和这劳力所生产的廉价原料便是这超额利润的来源。但廉价原料和廉价劳力都是前资本主义的,封建剥削关系下的产物。殖民地的经济落后和劳动大众的贫困化都是宗主国经济繁荣的另一面。财政资本为攫取超额利润起见,自然先要保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所以,欧、美资本主义破坏了东方各国的自然经济体系,把后者拉进了世界商品流通的洪流,但不曾成为这许多国度的普遍的自由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发动者,反而成了封建落后关系的维持者。这是辩证法的‘矛盾的合一’:财政资本的统治和前资本主义关系的结合。”<sup>⑥</sup>

这一逻辑也得到了调查资料的印证。首先,列强资本输出并非意图推动中国发展。英国对华投资最多,但仅有9%用于工商业,非生产性的地产投资和政府借款占总额的61.4%<sup>⑦</sup>。又如日本虽在华开采铁矿,但钢铁生产却在本土,对华轻工业投资亦高度局限<sup>⑧</sup>。其次,中国重要的雇工形式包身制,实际上仅是中世纪奴隶制的变相,而非资本主义雇佣关系<sup>⑨</sup>。同时,列强资本输出不仅未削弱封

<sup>①</sup> 张卓元、冒天启、旷建伟编:《孙冶方选集》,第13、15—16页。

<sup>②</sup> 张卓元、冒天启、旷建伟编:《孙冶方选集》,第18页。

<sup>③</sup>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第92页。

<sup>④</sup> 《孙冶方全集》第2卷,第76、73页。

<sup>⑤</sup> 张卓元、冒天启、旷建伟编:《孙冶方选集》,第19页。

<sup>⑥</sup> 张卓元、冒天启、旷建伟编:《孙冶方选集》,第44页。

<sup>⑦</sup> 张卓元、冒天启、旷建伟编:《孙冶方选集》,第51—52页。

<sup>⑧</sup> 张卓元、冒天启、旷建伟编:《孙冶方选集》,第56页。

<sup>⑨</sup> 张卓元、冒天启、旷建伟编:《孙冶方选集》,第2页。

建关系,反而加剧了其顽固性。根据调查资料,无锡、平湖、番禺等地地权集中严重。“残余的封建生产关系正因为财政资本的支持而能改头换面地在那里继续它的生命”,成为后者的代理人,“一方面促进农民手工业者的破产……另一方面阻止了土著民族工业的发展……这样使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又继续着再生产下去”<sup>①</sup>。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制下,中国俨然成为“资本主义已开始发展但苦于不能痛快发展的半封建社会”<sup>②</sup>。由此,孙治方不仅驳斥了“中国因列强资本输出步入资本主义”论断,更以实证论证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判断,凸显了调查研究作为知识检验工具的重要价值。

### 三、调查研究与立足本土实践的理论探索

除知识检验外,调查研究也是自主性理论探索的重要推力。一方面,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分为国内与国际两个向度<sup>③</sup>:国内向度聚焦学术规范独立性,国际向度则批判对西方理论的盲目“移植”<sup>④</sup>。两者本质上均源于对社会科学本质属性的深刻认知,即社会科学与现代国家的兴起密切相关,往往是特定国家的历史经验总结<sup>⑤</sup>。另一方面,自主性与本土化研究不同。本土化研究侧重外来知识的应用转换,而自主性则强调知识生产者的主体意识,要求主动以中国实践为逻辑起点<sup>⑥</sup>,回应时代需求,解决实际问题<sup>⑦</sup>。这种内涵要求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坚持问题导向<sup>⑧</sup>,从根本上摆脱“学徒心态”,不断发现“自主逻辑”,形成“自我主张”<sup>⑨</sup>。

新中国成立初期,孙治方的自主探索堪称典范,充分彰显了调查研究在培育问题意识、推动本土经济学自主探索中的重要作用。

#### (一) 对苏联统计制度的中国适用性调研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的实践与理论为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重要借鉴。在苏联专家协助下,我国通过制度移植迅速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工作也逐步向经济核算制转型。该制度以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学说为基础,以经济平衡表的形式对物质生产部门进行实物核算,旨在通过计划、考核、奖惩等机制不断改善生产,用最少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与之配套的统计制度同样借鉴苏联经验而建立。

1954年,孙治方调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为摸清统计制度运作情况,他先后前往湖北、湖南、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等省市进行调研,不仅同省(市)委的负责同志讨论情况,每到一地也“同统计局或计划统计科的同志接触,在合作社则主要同会计谈话”,“同地、县负责同志、区委书记、乡支书都谈过一次或二次话”<sup>⑩</sup>。此外,“为了了解实际情况,不犯主观主义错误”,他“经常深入下层去调查研究一定基层单位(一个乡、一个企业、一个机关等等)的情况”<sup>⑪</sup>。这一系列调研对他了解实际帮助很大,“很多意见在过去都是不敢肯定的,而现在则可较肯定地提出或加以修改了”<sup>⑫</sup>。

<sup>①</sup> 张卓元、冒天启、旷建伟编:《孙治方选集》,第77、82—83页。

<sup>②</sup> 张卓元、冒天启、旷建伟编:《孙治方选集》,第78页。

<sup>③</sup> 邓正来:《学术与自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自序第1—5页。此外,也有学者提出“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问题,指出其“学术自主”和“文化自觉”双重含义,与此处所引“两个向度”的观点相近,可参见刘小枫、苏国勋:《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开放时代》2006年第1期。

<sup>④</sup> 邓正来:《学术与自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第7—8、56—57页。

<sup>⑤</sup> 杨光斌:《论世界政治体系——兼论建构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的起点》,《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

<sup>⑥</sup> 杨立华:《以文明为方法: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和自主性建设的新路径》,《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3期。

<sup>⑦</sup> 熊易寒:《嵌入性自主:世界知识网络中的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9期。

<sup>⑧</sup> 刘守英:《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和一般性》,《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2年第6期。

<sup>⑨</sup> 高培勇:《找准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前进方向》,《光明日报》2025年5月14日,第11版。

<sup>⑩</sup> 《孙治方全集》第2卷,第38页。

<sup>⑪</sup> 《孙治方全集》第2卷,第68—69页。

<sup>⑫</sup> 《孙治方文集》第4卷,第46页。

在调研中,他敏锐地发现苏联统计制度在中国的不适用之处。一方面,在统计方法上,苏联以普查为主的模式依赖长期制度与专业人才积累,但新中国的统计工作几乎从零起步<sup>①</sup>,照搬该模式反而造成统计数据失真、滞后。另一方面,统计指标有很多是无用或重复的<sup>②</sup>,且过于侧重实物指标,“总产值”成为事实上的指标体系核心和企业考核唯一标准<sup>③</sup>。但其突出缺点,一是混淆了新创造价值和转移价值,造成资源浪费<sup>④</sup>;二是按不变价格计算,与企业财务账目的现价计算相冲突<sup>⑤</sup>,导致“企业管理人员并不很关心企业财务会计帐而只关心总产值计划……造成了许多虚假现象或假报告”<sup>⑥</sup>。这些突出问题引起了孙治方的关注。为了“全面地了解目前苏联的许多制度、规定、方法是在什么基础、什么条件下逐渐形成的,便于我们更好地结合中国的情况向苏联学习”<sup>⑦</sup>,1956年7月,他率领考察团赴苏联等国进行调研,并在回国后将调研形成的系统改革建议,以《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从“总产值”谈起》等为题陆续发表。

## (二)对统计制度改革的自主性探索

早在赴苏联等国调研前,孙治方就已与统计局同志商议,认为彼时的中国尚不具备全面普查的条件,应结合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的经验,采取普查与典型调查、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培养起人才队伍<sup>⑧</sup>。典型调查简便易行,可“用个别典型作实例来说明一般情况以及总的规律和趋势”,同时辅以抽样调查,“向领导提供一个足以代表全国全区的绝对数和相对数,以供领导作决策之用”<sup>⑨</sup>。如此,即便尚无法全面普查,亦能及时为各级领导机构提供可靠的统计数据。在苏联考察时,孙治方从座谈中发现,苏联统计制度初创阶段也曾借鉴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的方法<sup>⑩</sup>。这既印证了以本土经验改进苏联模式的可行性,也为立足国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现实依据。

调研回国后,孙治方围绕统计指标体系的改革提出系统性的构想。他强调立足中国经济实践,科学精简统计指标,“使各种科目、指标结成一个统一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up>⑪</sup>。同时,为真正发挥经济核算的作用,他深入反思“总产值”指标在实践中的弊端,明确提出指标设计的基本原则:(1)指标应反映生产增长的真实情况;(2)计划统计指标和企业管理会计账目应统一起来,而非互相妨碍;(3)指标体系应兼顾物量(使用价值)与劳动消耗量(价值)的计算,基层企业更应侧重后者;(4)基本指标应是企业管理的中心环节,具有统摄带动其他指标的功能<sup>⑫</sup>。基于此,他提出以“利润”为核心指标。而要让“利润”发挥中心指标的作用,还需解决两个前置问题:一是“价格应该同价值相符”<sup>⑬</sup>,要改变苏联模式下价格对价值的背离,使其准确反映企业生产效率与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二是“注重无形磨损,提高折旧率”<sup>⑭</sup>,纠正苏联指标体系对技术进步与固定资产无形贬值的忽视,重视投资效果的计算和分析。这些回应现实问题的政策建议,不仅成为孙治方长期坚持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思路,也构成了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

① 《孙治方全集》第2卷,第94页。

② 《孙治方全集》第2卷,第84页。

③ 《孙治方全集》第2卷,第4页。

④ 《孙治方全集》第2卷,第16—18页。

⑤ 《孙治方全集》第2卷,第18页。

⑥ 孙治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1页。

⑦ 《孙治方文集》第4卷,第199页。

⑧ 邓加荣:《孙治方传》,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180页。

⑨ 《孙治方全集》第2卷,第69、72页。

⑩ 邓加荣:《孙治方传》,第181页。

⑪ 《孙治方全集》第2卷,第86页。

⑫ 《孙治方全集》第2卷,第29页。

⑬ 孙治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130页。

⑭ 孙治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40页。

### (三)在反思中形成价值规律理论创新

孙治方并未止步于政策建议,而是进一步追溯问题的思想根源。他发现,苏联“总产值”管理模式与经济效率的矛盾本质上源于“否定了或者是低估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sup>①</sup>。苏联经济学界将价值规律视为资本主义范畴,误认为其在社会主义中“只是在两种所有制的边缘上、在交换的过程中才产生出来的”<sup>②</sup>,进而主张“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物质财富……一切计算工作应该是着重于计算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sup>③</sup>,导致“着重于表现物量,而忽视了价值,着重于表现生产的成果……而不着重于分析这成果的内容如何……更不着重于分析如何以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的计算来提高劳动生产率”<sup>④</sup>。

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深受苏联影响,亦难以摆脱这些局限:由于“理论上否定或是低估了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作用”,价格制定未重点考虑价值,也“很少考虑生产过程本身的经济核算的需要”<sup>⑤</sup>,造成了“普遍遭受批评的那些计划统计方法和无视价值的价格政策”<sup>⑥</sup>,导致资源浪费与国民经济核算失真;设备管理制度“只考虑了物质的磨损,而不曾考虑无形磨损”,也是与否认价值规律的理论一脉相传的<sup>⑦</sup>,严重妨碍了设备更新与技术进步。孙治方由此指出,“环绕着价值规律和总产值这一周围的问题,正是我们计划统计脱离实际的基本来源”<sup>⑧</sup>。

为突破传统理论的局限,他提出“广义价值规律”,指出价值规律“是‘形成价值实体’的社会必要劳动的存在和运动的规律”,主张社会主义应通过直接计算劳动成本来调节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推动生产力发展<sup>⑨</sup>。而对于这一规律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他运用矛盾分析法,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毛泽东思想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加以分析,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最深远的矛盾是“‘人’与‘物’的矛盾”,表现为“如何以更少的劳动获得更多的产品……就是: $\frac{\text{产品}}{\text{劳动时间}}$ ,也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公式”<sup>⑩</sup>,恩格斯“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著名论断也同样蕴含其中<sup>⑪</sup>。这种矛盾运动在商品变为不经市场而进入消费的产品后仍然存在<sup>⑫</sup>,对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间的分配起支配作用<sup>⑬</sup>。因而,“在一切经济规律中,价值规律是最基础的或第一条规律”<sup>⑭</sup>。广义价值规律的提出突破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框架,重新确立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不仅对我国政治经济学建设有深远意义,也对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 四、调查研究与本土经济学学术规范的探索

调查研究作为联结现实与理论的重要路径,既能推动本土理论创新,也对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

- 
- ① 《孙治方全集》第2卷,第24页。
  - ② 孙治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修订本),第149页。
  - ③ 孙治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修订本),第273页。
  - ④ 孙治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3—4页。
  - ⑤ 孙治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35页。
  - ⑥ 《孙治方全集》第2卷,第8页。
  - ⑦ 孙治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37、40页。
  - ⑧ 《孙治方全集》第2卷,第53页。
  - ⑨ 孙治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96、119页。
  - ⑩ 孙治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65页。
  - ⑪ 孙治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43页。
  - ⑫ 孙治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65—66页。
  - ⑬ 孙治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119—120页。
  - ⑭ 孙治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371页。

构建有积极意义。自主知识体系是由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构成的有机整体<sup>①</sup>。其中,学术体系是基础<sup>②</sup>,是由研究领域内学术组织机构、评价体系、学术共同体等要素结合形成的体系<sup>③</sup>。而加强“三大体系”建设则以“两个结合”为核心路径<sup>④</sup>。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尚未具备全面系统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条件,但孙治方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风气与基于调研的研究范式,均契合“第一个结合”的要求,可为当代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宝贵经验。

### (一) 调查研究与理论联系实际学风的塑造

学术共同体是学术体系的主体载体,在中国语境下通常指以专业化为本质,共享某种研究范式与学术旨趣的学者群体<sup>⑤</sup>。学术风气则是该群体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的特殊社会风气。学术风气与学术发展息息相关<sup>⑥</sup>,良好的学术风气能持续推动学术体系的优化。

1957年底,孙治方担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所长后,便以系统化的调研为抓手,积极推动营造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风气,引导学术共同体调整研究取向。他不仅大力提倡理论联系实际,更在体制机制与学术实践层面作出了实质性推动。他明确要求研究人员走出科研大门,直面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现实问题,在调研中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克服闭门造车、脱离实际的毛病。他到任后的首项改革,便是向中央申请将经济研究所改由中国科学院与国家计委双重领导,由计委直接就实际问题向研究人员出题目,经委和统计局给予资料和参加会议的便利,“打通了正常的从事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渠道和资料的源泉”<sup>⑦</sup>。与此同时,他还与农业合作社、工厂、商店等基层部门建立联系制度,组织研究人员分批分期深入一线蹲点调研,逐步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调查研究机制。更重要的是,他以身作则,亲自带队下基层调研。1961年,孙治方针对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经济核算等问题,赴上海机床厂和上棉一厂进行调研,亲自拟订调查提纲、确定参会对象并主持座谈会。他的许多独到见解均源于深入调查后的系统分析与深刻思考<sup>⑧</sup>。在调研过程中,他特别强调透过现象看事物本质,多问一个“为什么”,分清本质与非本质问题,抓住重点,摸清情况,找出原因,最终去芜存菁,提升到理论高度<sup>⑨</sup>。他对调查研究的大力倡导,不仅推动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建设;更通过持续的调研实践,为我国培养出一支既理论功底深厚又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队伍,这些学者直至1978年仍是经济研究所的骨干,这就为改革开放时期的理论探索与政策制定,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 (二) 立足客观过程的研究范式探索

在推动学风转向的同时,孙治方也着力探索经济学研究程序问题,明确提出“为建立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写出几本书”<sup>⑩</sup>。他高度重视理论著作的基础作用,认为书(图书)、刊(期刊)、资(资料)、会(会议)中,“书放在第一是没有疑问的,因为这是重点”<sup>⑪</sup>,并以主持编写具有教科书性质的著作——《社会主义经济论》为契机,积极推进研究程序的建设。从当代视角来看,教科书及理论著作的持续出版是范式确立与巩固的重要标志,也是范式凝聚与传承的规范性载体,范式作

---

① 赵联飞、徐威:《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原理与路径》,《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② 简新华:《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的十年进展》,《当代经济研究》2023年第1期。

③ 臧峰宇、沈江平、王立等:《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使命和议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

④ 张政文:《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人民日报》2024年10月28日,第9版。

⑤ 王浩斌:《学术共同体、学术期刊与学术评价之内在逻辑解读》,《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第3期。

⑥ 朱剑:《学术风气、学术评价与学术期刊》,《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⑦ 《孙治方全集》第3卷,第224页。

⑧ 雍文远:《学习孙治方同志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回忆一九六一年上棉一厂调查》,《财经研究》1983年第2期。

⑨ 费文星:《学习孙治方同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财经研究》1983年第2期。

⑩ 《孙治方文集》第7卷,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第97页。

⑪ 《孙治方文集》第5卷,第31页。

为共识性实践框架,包含学术共同体成员公认的理念、规则与方法,构成一定时期内研究与实践的共同基础。可见,孙治方已实质性触及研究范式层面。

在《论价值》中,孙治方便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按照怎样的程序加以研究”的命题,并主张“基本上应该按照马克思写《资本论》的程序来研究”<sup>①</sup>。自1959年冬起,他主持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开启了以此为载体对研究范式的推动。

在框架设计上,他明确主张摒弃传统教科书“规律排队”和“政策汇编”的松散模式,采用《资本论》的结构和方法。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研究中,并不是到处给规律下定义,而是通过对客观经济过程的分析,清楚地阐明了经济规律”<sup>②</sup>,“给我们提供了解剖现代化大生产的一个基本模式”<sup>③</sup>。在写作思路上,他特别强调运用《资本论》的“过程法”,即既从客观过程出发又强调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方法<sup>④</sup>,而客观经济过程“就是生产和流通过程,总起来就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sup>⑤</sup>。这一思路实际确立了以“现实经济过程”为中心的研究程序。他曾明确表示“这个初步设想与其说是我们的写书提纲,毋宁说是我们学习和研究的提纲”<sup>⑥</sup>,编写团队“自从参加了这本书的提纲的讨论和编写工作以后,对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对某些现实经济问题的认识也比较全面和提高了”,也意识到“写书同研究现实经济问题非但不互相排斥,而且是相互促进的”<sup>⑦</sup>。在编写中,他也逐步将自身理论系统化,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并希望这些方法和体系可为后继者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参考<sup>⑧</sup>。

### (三)调查研究对研究范式形成的推动

为将“过程法”落到实处,孙治方在《社会主义经济论》编写中极为重视调查研究的基础性作用。他多次提到,“在着手编写初稿时,我们就强调研究经济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从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运动过程出发,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加以分析、研究和概括”;“我们始终反对研究不从实际过程出发而从原则、概念和规律出发的错误方法,因为人们的思想必须符合客观实际,一切原则、原理必须在研究客观存在的事实之后才能得到”<sup>⑨</sup>。

为确保编写质量,他要求编写人员不要匆忙写书,要先对负责的专题深入调研,用两三年时间每年研究一两个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重大问题,并积极支持在工厂、商店和农村搞科研“试验田”,亲自带领研究人员到工厂蹲点,为写书积累素材。他认为,“初稿最基本的缺陷,就在于对许多问题研究不够,对这些问题平时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调查研究,没有较长期的专门的资料积累。今后无论是为了提高写书的质量,也无论是为了提高研究队伍的水平,当务之急是认真加强调查研究。对于我们来说,既要深入工厂、商店、农村人民公社进行实际经济过程的深入调查,又要充分利用有关的调查资料或调查报告,既要有典型资料的积累,又要有全面资料的积累和全面的统计资料”<sup>⑩</sup>。

同时,他强调在书稿编写中要总结和提炼中国本土的经济建设经验。他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有许多是带有普遍意义的,我们在书中应当加以分析和论证,而不应当只是简单地

<sup>①</sup> 孙治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123页。

<sup>②</sup> 孙治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第101—102页。

<sup>③</sup> 孙治方:《〈社会主义经济论〉导言(大纲)》,《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sup>④</sup> 孙治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第9页。

<sup>⑤</sup> 孙治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第101页。

<sup>⑥</sup> 《孙治方文集》第5卷,第87页。

<sup>⑦</sup> 《孙治方文集》第5卷,第51页。

<sup>⑧</sup> 《孙治方文集》第6卷,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第142页。

<sup>⑨</sup> 孙治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第8、9页。

<sup>⑩</sup> 孙治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第16页。

下结论式地说明一下”,“我们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给中国人读的,当然要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要尽可能多引用中国的实际资料,讲中国经验”<sup>①</sup>,“以中国材料为主,旁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sup>②</sup>。并且,“对于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来说,只采用《资本论》中可用的范畴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创立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新的范畴”,对新范畴的构建“要从中国经验出发……从中国的具体实践中来说明这些范畴”<sup>③</sup>。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一个渐进过程,“需要在‘写一学(包括调查研究、学习政策和理论、积累资料,等等)一写’的循环中,不断提高”,“要总结前一时期进行调查研究的经验,很好地研究和组织今后的调查工作”<sup>④</sup>。在他看来,调查研究不仅是“过程法”得以贯彻的方法基础,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规范确立的重要支撑。

## 五、孙冶方调查研究的当代启示

孙冶方的调查研究以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内核,兼具灵活性与系统性,构成贯通实践与理论的科学研究路径,不仅有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深度结合,也为经济学探索提供了关键支撑。尽管“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命题彼时尚未提出,但孙冶方的探索经历仍可为当代学者以调查研究推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有益启示。

第一,将学科立场、观点与方法深度融入调查研究全过程,实现理论与现实的双向贯通。孙冶方始终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贯穿于调查研究各环节,这一世界观与方法论体系深刻塑造了其思维框架与研究取向。对于当代学者而言,尽管研究范式各异,但均需重视在学科理论与框架指导下开展系统性调研,运用规范化分析工具与方法,实现理论与现实的双向贯通,从现象表象中提炼核心范畴与关键数据,揭示经济规律,形成既符合学术规范、又回应实践关切的研究成果。借助研究范式的融入,调研不仅是认识现实的操作性认知工具,更成为推动知识生产与体系建构的科学路径。

第二,在调查研究中培育立足中国现实的问题意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扎根于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而非抽象的理论设问。对问题的直觉是一种基于深度经验的再认识,唯有对国情进行长期、系统的观察,才能察觉异常、识别问题。孙冶方正是在持续深入的调研中,敏锐捕捉到苏联模式与中国实践的内在矛盾,进而在反思中推进理论发展。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现实中不断涌现既有理论难以有效解释的新问题。“重要事实—理论突破”的生成链条,正是以中国为中心提出问题的研究路径,也是知识体系走向自主性的起点。

第三,以调查研究推动知识的生产与检验。知识体系构建既依赖理论创新,也需要以实践检验理论的有效性与解释力。孙冶方坚决反对脱离实践的教条主义,以调查研究作为推动知识生产和检验的重要路径。当代学者亦应高度重视调研在知识生产与检验中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摸着石头过河”、试点先行的渐进式改革实践,为经济理论提供了大量可供验证的现实样本,通过构建“调研中验证理论、反思中完善知识”的良性机制,既可保障理论创新的现实根基,又可强化知识体系的实践韧性,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生产的重要支撑。

---

①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第5页。

②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第76页。

③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第14、111页。

④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第17页。

##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in Building China's Autonomous Economic Knowledge System: A Study on Sun Yefang's Academic Explorations

Li We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0, P.R.China)

**Abstract:** Building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in economics is the core miss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economists. The key lies in grounding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n China's indigenous practice to form a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both explanatory power and practical guidance. The systematic methodology of the "Two Integrations" provides crucial direction, whil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constitute an essential path for implementing the "Two Integrations" and supporting system construc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un Yefang, a pioneering explorer of Chinese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regarded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as fundamental to economic scholarship. Taking materialist dialectics as his methodological core, he transformed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from mere technical tools into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approach linking "field investigation—data compilation—theoretical analysis." His academic exploration effectively addressed the three core dimensions of China's autonomous economic knowledge system—"knowledge," "autonomy," and "system"—thus providing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for building China's autonomous economic knowledge system. In the 1930s, he participated in surveys of China's rural economy, systematically collecting first-hand data and clarifying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rural economy, powerfully substantiating the proposition that China was a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and demonstrating the critical role of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in knowledge verifica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rough investigations into statistical work, he keenly identified the unsuitability of the Soviet statistical system for China. Through critical reflection, he revealed Soviet economics'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of value, creatively proposed the "law of value in its broad sense," and re-established its central position in the socialist economy, achieving autonomou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grounded in indigenous practice. Regarding academic norms, Sun promoted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rough institutional reforms, established systematic grassroots research mechanisms, and cultivated economic talents. Using the compilation of *On Socialist Economy* as an opportunity, he developed a research paradigm centered on "objective economic processes," emphasizing experience summation and new category creation from Chinese practice—constituting important explorations in building China's economic academic system. His experience offers crucial insights for contemporary scholars building China's autonomous economic knowledge system: first, deeply integrating disciplinary standpoint, viewpoint, and methodology throughout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process to achieve two-way penetration between theory and reality; second, cultivating problem consciousness rooted i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hird, driving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verification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o strengthen the realistic foundation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Keywords:** Sun Yefang;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Chinese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Two integrations

[责任编辑:王玲强]